

直面大转型时代

——吴敬琏谈全面深化改革

吴敬琏 著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

014043797

F121
232



直面大转型时代

——吴敬琏谈全面深化改革

吴敬琏 著



北航

C1731385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生活书店 出版有限公司

F121
232

Copyright © 2014 by Life Bookstore Publishing Co.Ltd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版权由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直面大转型时代: 吴敬琏谈全面深化改革 / 吴敬琏著 .

— 北京: 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 2014.5

ISBN 978-7-80768-037-6

I . ①直… II . ①吴… III . ①中国经济—经济体制改革—研究 IV . ① F1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35860 号

出 版 人 樊希安

特约编辑 马国川

责任编辑 郝建良

装帧设计 罗 洪

责任印制 常宁强

出版发行 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4年5月北京第1版

2014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635毫米×965毫米 1/16 印张24.25

字 数 320千字

印 数 00,001-20,000册

定 价 42.00 元

(印装查询: 010-64002717; 邮购查询: 010-84010542)

前 言

本书是2007年—2013年我的文章选编，收录了这个时期的五十篇文章。这些文章不仅记录了我对于一些重大问题的思考，也从思想理论的侧面反映了过去一个时期中国改革和发展的历程。

21世纪的开头十几年，是一个思想上风云激荡的年代。从世纪初开始，随着中国改革进入所谓的“深水区”，一些旧体制和老路线的支持者就以腐败蔓延、贫富分化等现象的存在为借口，运用民粹主义和国家主义的口号误导大众，对改革开放展开了攻击，要求回到“计划经济为主”，甚至“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的旧体制中去。从2007年开始，为了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学界对于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总结。人们列举大量事实证明，市场化改革是支持中国经济高速度成长的最主要的推动力量。这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此前数年间对改革开放的攻击。不过，回到过去还是深化改革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方针和路线之间的争论并没有止息，甚至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一些发达国家的经济遭受重创之后变得愈发激烈起来。我自己积极参加了这场争论，本书第一辑收录的文章就反映了我对于改革开放30年历史的思考。同时还参考历史上国家兴衰、社会转型的经验，对中国面临的挑战和应对的方略进行了分析。

在我看来，改革开放30年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由于现有体制从旧体制继承下来的缺陷，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仍然面临一系

列严峻的挑战。在经济方面，靠资源投入和出口需求驱动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导致的资源短缺、环境破坏等问题日益突出，内外经济失衡加剧，金融市场面临系统性风险，宏观经济政策也陷入既不能松又不能紧的两难困境。在社会政治方面，经济和政治改革迟滞造成的寻租基础扩大、腐败蔓延和贫富分化导致大众强烈不满，威胁社会安定。因此我呼吁排除障碍，推进改革，建设法治的市场经济。（参见《论中国改革的市场经济方向》、《经济学与中国经济的崛起》两文）

本书第二辑的文章集中反映了我对于中国经济面临的短期问题和长期问题的看法。

鉴往知来，纪念改革开放 30 周年本来是总结经验、存利去弊，推进改革的大好机会，但是长达 30 年的经济高速增长让国内洋溢着乐观的气氛，对 30 年中国发展成绩的展示和与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发达国家窘境的对比，使人们很难接受对于中国现行体制和发展政策的批评。对于这种无视自身缺点和不足的盲目乐观情绪，我感到不安。2008 年 4 月，我在上海的一次讲演中指出，在主要靠投资和出口支持的粗放型增长模式下，中国资产泡沫的严重程度已经不亚于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和亚洲金融危机前夕的水平，CPI 涨幅也超出了温和通胀的水平。我指出，为了稳定经济，避免发生大的金融和经济危机，除了运用短期政策稳定宏观经济外，还必须采取改革措施，排除增长模式转型的体制性障碍，实现我国的产业升级。（参见《通货膨胀与资产泡沫源自难以为继的增长模式》一文）

2008 年 8 月的北京奥运会结束不久，早在 2007 年冒头的流动性短缺爆发为全球的金融危机。由于出口订单减少，中国经济增长率也出现下降。实际上，金融危机的冲击仅是外因，中国经济困难更多是内因所致。中国旧有增长模式的特点，是依靠大量投入来支撑经济的高速增长。面对这种增长模式必然导致的消费需求不足和产能过剩问题，再用出口导向政策刺激出口，用净出口需求弥补国内需求的不足。东亚国家在发展的早期阶段往往能够利用自己和发

达国家之间存在的储蓄—投资差额的“镜像互补”关系，成功运用出口导向政策支持高速增长。但是他们的经验也表明，发展到一定阶段，这种政策就必须进行调整，否则将会造成日本等许多东亚国家都发生过的灾难。（参见《全球金融危机与中国经济》一文）总之，经济发展方式的这种特点使得中国经济难以持续早在意料之中。救治的方法，也只能是推进改革，消除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体制性障碍，实现效率的提高。（参见《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一文）但主流意见把凯恩斯主义的短期分析方法误用到长期趋势的估量上，以为只要用财政、货币政策创造足够的需求，待到西方国家经济走出危机，增加进口，中国经济就可以全面复苏。在这种意见的影响下，中国政府在2008年末出台4万亿投资和10万亿贷款刺激经济，誓言保持8%以上的经济增长速度。

中国的救市大手笔赢得了国内外的许多赞誉，而我却乐观不起来。从理论上说，我在为阿米蒂·什莱斯的《新政 VS 大萧条：被遗忘的人和事》^①中译本所写的序言里，写下了自己对过分依赖凯恩斯主义式的强刺激政策的担心：“经济复苏的苗头萌出后人们所产生的乐观情绪很可能使我们不去继续深化对危机产生机理的认识，不能正确处理后危机阶段的各种后续的政策问题，从而重蹈覆辙。”（参见《危机时期的政策反思》一文）

经济增长模式从依赖投资和出口驱动的粗放型增长到依靠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支持的集约型增长转型，在很长时期中是我的一个研究重点。在2007—2013年期间，我就与经济增长模式转型有关的理论和政策问题反复表达了自己的意见。在我看来，这才是中国实现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真正出路。

“十一五”（2006—2010）期间经济发展方式转型规划执行得不够好，使各级政府加大了它们对发展转型和结构优化的推动力度。

^① Amity Shlaes (2008): *The Forgotten man: A New History of the Great Depression*, Harper Perennial; 中文译本书名改为《新政 VS 大萧条：被遗忘的人和事》，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年第1版。

但是，命令经济中政府的行为方式在中国仍然保持着强大的影响力，许多党政领导机关还习惯于用政府主导的方式推动技术创新和结构调整，结果抑制了民间创造力的发挥，造成了很大的浪费。本文集中的多篇文章对政府在经济转型和企业创新中的正确作为进行了讨论。（参见《政府在促进发展转型中要有所为、有所不为》和《政府不应在“调结构”中起主导作用》两文）

用城市化推动工业化和现代化，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另一个重大课题。在中国应当如何推进城市化的问题上各界人士发表了各不相同的意见。本文集中也有两篇讲话参加这一讨论。（参见《我国城市化面临的效率问题和政策选择》和《全面深化改革与新型城镇化》两文）

收录在本书第三辑的文章表明了我对于在 21 世纪初期被重新提出的“中国向何处去”这个重大时代命题的回答，这就是必须尽快重启改革议程。

新世纪以来，由于改革的停滞，在经济繁荣的掩盖下各种经济社会矛盾在迅速积累。一方面，资源短缺，环境破坏愈演愈烈，甚至人类的基本生存条件水、土、空气也遭到损坏；另一方面，腐败蔓延，贫富差别悬殊，群体性事件日趋增多，而且暴力化倾向越来越明显，甚至出现某些短暂的、地区性的社会骚乱。这些情况表明，中国的社会经济矛盾已经达到了一个临界点，除了法治市场经济和权贵资本主义哪个跑得更快，中国还面临着改革和革命的赛跑。“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尖锐地摆在我们面前，成为亟须解答的时代命题。（参见《2012 中国向何处去》一文）

由于人们对于这些社会经济矛盾的由来作出了不同的解读，提出的解决之道和政治诉求也天差地别。一种主张是强化政府和国有经济对社会的管控和对市场的“驾驭”。有人鼓吹，正是以强势政府控制整个社会经济体系为特征的“中国模式”成就了“中国奇迹”。它也将成为世界仿效的榜样。“中国模式论”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宣扬。

我在多个场合批评“中国模式论”。而且我担心，这种被称为

“中国模式”的体制如果真的确立起来，将对经济、社会、政治体制的完善造成很大的威胁，而且早晚会导致严重的社会经济后果。（参见《“中国模式”，还是过渡体制？》一文）

在本世纪初期发生的“重庆事件”表明，在腐败猖獗、公平正义得不到伸张的情况下，某些枭雄式的人物有可能利用社会矛盾，用“打土豪、分田地”一类极端“革命”的口号，误导深受权贵压榨因而热切希望获得公平正义的大众，把他们引向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歧途，使建设现代中国的进程遭到中断。因此，我大声疾呼重启改革议程，“只有坚持市场化、法治化、民主化的改革道路，建立包容性的经济和政治制度，这样中国才有光明的未来。”（参见《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包容性的经济和政治制度》一文）

本书第四辑的文章反映了我对如何重启改革的思考和对改革的建议。

社会各界要求重启改革议程的呼声，在2012年11月召开的中共十八大上得到了回应。十八大重申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目标，把全面深化改革提上了议事日程。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面对的问题已经不是要不要重启改革，而是如何重启改革了。于是，有不少社会组织和关心国家前途的人士认真探索出现问题的体制性原因，积极提出改革建议。根据以往改革的经验，我认为要采用问题导向的方法列出改革项目清单，并且从中筛选出最重要和关联性最强的改革项目——“最小一揽子”改革方案，突破关键领域的改革。（参见《当务之急：研制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规划》一文）

我认为，新一轮改革的核心应该是建立竞争性市场经济体系。市场经济是一个复杂精巧的巨大系统，进行系统化的市场经济改革需要预先进行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

在社会各界的努力下，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它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对以完善市场经济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为总目标的全面改革作

出了战略部署，是中国下一轮改革的总体设计和行动纲领。它将引领中国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入，建立起一个更加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架构和现代国家治理体系，这对实现中华民族的腾飞、中国的现代化转型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参见《打好全面深化改革的攻坚战》一文）

本书第五辑里，记录了知识分子在这个大转型时代的艰难探索。1840年以来，中国一直处在大转型的过程中，其间波涛汹涌，百折千回，好几代中国人为了建设一个现代化国家而努力奋斗。知识分子更是将探索中国现代化转型的道路作为自己的责任，不懈追求，百折不挠。我有幸结识了许多当代的优秀知识分子，他们有的是我的师长，有的是我的朋友，都给予我教益和帮助。近年来我写了一些反映我与他们交往的文章，在一些文章中也反思了自己的人生历程。

中国现在站到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新一轮改革正在逐步展开。在这样的历史时刻，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改革是一场除旧布新的革命，必然会遭遇来自陈旧意识形态的阻力，面对来自以权谋私特殊既得利益者设置的障碍，还要解决在旧体制和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下积累起来的种种实际困难。重重艰难险阻需要我们共同努力去克服。我衷心地希望，大家都参与到推进改革的事业中来，为推动中国的现代化转型增添力量。建设一个富裕、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中国，是我们每一位公民的责任。

希望本书的相关讨论，对于这场大转型的观察者和参与者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三联书店的李昕总编辑最先提出编辑此书的动议，特约编辑马国川先生和责任编辑郝建良先生承担了繁重的编辑任务。张馨文女士出色地完成了文稿整理和录入的工作。没有他们的帮助，本书就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面世。故此，我对他们表示真诚的感谢。

吴敬琏

2014年1月30日除夕夜

目 录

前言

第一辑 让历史照亮未来的道路

论中国改革的市场经济方向（2008年7月） / 3

从《大国崛起》看各国富强之道（2007年2月） / 22

“左”的和“右”的极端主义都会带来灾难

——谈《西班牙旅行笔记》（2007年11月） / 33

经济学与中国经济的崛起（2011年7月） / 39

第二辑 中国经济面临的短期问题和长期问题

为技术创新和增长方式转型构建良好的环境（2007年8月） / 61

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源于难以为继的增长模式（2008年4月） / 66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对金融危机和中国经济的思考（2008年9月） / 71

全球金融危机与中国经济（2008年11月） / 75

危机时期的政策反思

——阿米蒂·什莱斯《新政 VS 大萧条》一书序言（2009年12月） / 86

政府在促进发展转型中要有所为、有所不为（2010年8月） / 92

“十二五”中国宏观经济态势和展望（2011年5月） / 94

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问题是什么？（2011年11月） / 108

警惕过度投资，寻求转型对策（2013年2月） / 115

实现经济发展转型刻不容缓

——《中国增长模式抉择》第四版序言（2013年8月） / 117

政府不应在“调结构”中起主导作用（2013年10月） / 127

我国城市化面临的效率问题和政策选择（2012年10月） / 132

全面深化改革与新型城镇化（2013年11月） / 140

第三辑 呼吁重启改革

关于拆迁问题的三点意见（2009年12月） / 151

高铁，中国模式的“奇迹”？（2010年5月） / 156

“中国模式”，还是过渡体制？（2011年9月） / 161

2012年的机遇与风险（2012年2月） / 165

2012中国向何处去（2012年5月） / 169

全面推进改革才是反腐败的治本之策（2012年10月） / 179

中国改革还走在半路上（2013年5月） / 194

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包容性的经济和政治制度

（2012年10月） / 201

不改革，死路一条（2013年6月） / 213

第四辑 如何重启改革

当务之急：研制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方案（2013年2月） / 221

没有竞争的市场比没有市场更可怕（2013年2月） / 224

以“最小一揽子”方案突破关键领域改革（2013年3月） / 233

中国新时期的改革议程（2013年4月） / 238

中国改革：总体方案和当前举措（2013年4月） / 247

为即将到来的改革大战役做好准备（2013年7月） / 253

再谈法治中国（2013年9月） / 257

具体改革项目研究（四篇） / 274

之一：重启国有经济改革才是出路（2012年6月） / 274

之二：要把医疗费用的筹措和医疗服务的提供分开（2013年2月） / 276

之三：研究基本问题，谋划长期发展（2013年6月） / 277

之四：改革方案需要精心设计（2013年3—11月） / 281

打好全面深化改革的攻坚战（2013年11月） / 286

对话科尔奈教授：中国转型之路（2013年12月） / 298

第五辑 知识分子的责任、追求与情怀

中国需要这样的思想家——纪念顾准诞辰80周年（1995年3月） / 321

“常怀千岁忧”的思想者——悼念王元化先生（2008年6月） / 330

一位正直、严谨的经济学家——怀念骆耕漠老师（2009年6月） / 333

诗人的义愤和法律人的理性汇合而成的呐喊（2010年12月） / 338

薛暮桥与中国市场经济的开拓（2011年6月） / 341

重归文明，续写文明——在《资中筠自选集》首发式上的发言

（2011年10月） / 352

纪念一位坚持理想、勇于自省的“老派共产党人”徐雪寒

（2011年11月） / 355

学术勇气和社会担当——悼念陆学艺（2013年5月） / 360

“于光远追思会暨于光远经济理论研讨会”的主持发言

（2013年10月） / 365

毕业以后——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2011年毕业典礼上的讲演

（2011年6月） / 368

发扬复旦精神（2012年10月） / 373

第一辑

让历史照亮未来的道路

论中国改革的市场经济方向^{*}

(2008年7月)

从1978年12月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的改革开放至今，已经走过了30个年头。改革开放所要达到的目标，按照中共十七大的语言，可以概括为“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现在，这个历史转折还没有完全实现。为了完满地实现这个转折，我们应当认真总结30年的经验教训，让历史照亮我们未来的道路。

“摸着石头过河”，寻求在困境中奋起的路径

中国在1953年正式确立“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们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为目标的“过渡时期总路线”^①以后，经过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全面建立了苏联式的集中计划经济制度。

僵硬的计划经济体制使生产效率和服务质量急剧下降。由于处于国家计划机关附属地位的“生产单位”即企业失去了经营自

^{*} 本文为作者2008年7月25日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理论研讨会”上的演讲。原题为《让历史照亮未来的道路：论中国改革的市场经济方向》。

^① 中共中央宣传部（1953）：《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

主权和生产积极性，国有经济的领导人对从苏联引入的新体制尤其感到不满。

面对党内外对苏式计划体制的批评，党政领导考虑对这一体制作出调整。至于调整的方向，则有很不相同的考虑。经济工作的主要领导人陈云主张在保持国有经济的统治地位和坚持计划经济的前提下，引入某些市场经济的因素^①。而作为党和国家最高领袖的毛泽东则认为，问题并不在于行政化的计划经济，而在于“权力过分集中于中央”，管得过多，统得过死^②。于是，在1958年发动了向各级地方政府“放权让利”的“体制下放”运动，形成了一种分权型的命令经济体制^③。与此同时，毛泽东还支持“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极“左”思潮^④，发动了把农业生产合作社改组为“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和“超英赶美”的“大跃进”运动。这两大运动猛刮“共产风”，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困难和2000万~4000万人“非正常死亡”的生命损失^⑤。

对于1958年以后的严重困难，毛泽东并不认为是缘于“公社化”、“大跃进”和“共产风”的错误，相反却认为根本原因在于干部群众的“共产主义觉悟不高”和刘少奇、邓小平等党政负责人背离了他所倡导的革命路线。于是，他在1966年根据“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谓“无产阶

① 陈云（1956）：《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新问题》，《陈云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13页。

② 毛泽东（1956）：《论十大关系》，《毛泽东选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72—276页。

③ 对于这种体制的弊病，可以参阅吴敬琏（1999）：《当代中国经济改革》，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3年版，第49—54页。

④ 张春桥1958年9月16日在上海《解放》杂志发表了《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的文章。毛泽东亲自下令《人民日报》（1958年10月13日）转载，并且为它写了推荐按语。

⑤ 关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后全国非正常死亡人数的估计请参阅孙冶方：《加强统计工作，改革统计体制》，载《经济管理》杂志，1981年第2期；程敏：《风云庐山》，团结出版社，1993年版，第364页；李成瑞：《“大跃进”引起的人口变动》，载《中共党史研究》，1997年第2期；曹树基：《大饥荒：1959~1961年的中国人口》，载《中国人口科学》，2005年第1期。